

向宗鲁《史记讲义》考述

苏 芃

内容摘要: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佚名《史记校注》一部,经查证研究,该书内有多处“承周案”字样的案语,且有一部分与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向宗鲁《八代文讲义》所用稿纸一致,版心处有“向授”字样,结合向宗鲁先生的学行经历,可断定该书为民国时期向先生在四川一带教授《史记》课程的讲义。

关键词:向宗鲁 《史记讲义》

中国国家图书馆(下简称“国图”)藏有佚名《史记校注》一部,经过笔者查考,发现此书当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向宗鲁先生遗著。

一、国图藏佚名《史记校注》作者考证

《史记校注》现存一册,是据稿本油印的线装本,国图著录为作者佚名,出版发行时间定为民国。

笔者通过仔细阅读其内容,查验相关资料,判定该书作者为民国时期学者向宗鲁先生。向宗鲁,原名永年,学名承周,字宗鲁,以字行世。祖籍重庆巴县,1895年生于四川省涪陵县,受业于文伯鲁(寿昌)、廖平(季平)诸先生,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、四川大学,并长期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,1941年11月去世,年仅46岁。先生博闻强识,刻苦笃学,自幼有“神童”之誉^①。其著作等身,可惜传世的仅有寥寥几种,且多是歿后经弟子王利器、屈守元等先生整理出版与发表的,有《周易疏校后记》、《校雠学》、《月令章句疏证叙录》、《说苑校证》、《淮南鸿烈简端记》等。

判定国图藏《史记校注》作者为向宗鲁先生,主要证据有以下四点:

第一,《史记校注》由大量札记组成,许多札记下都有“承周案”字样的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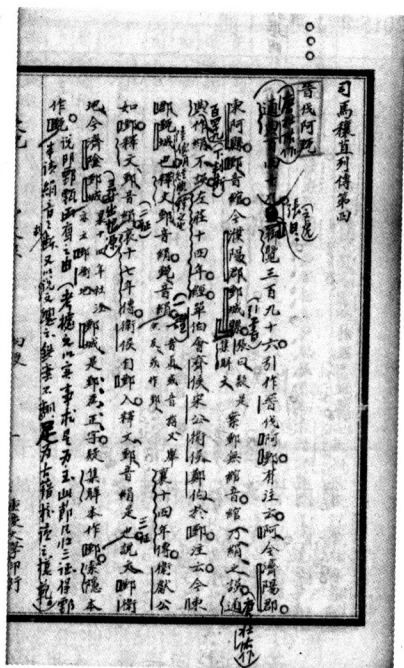
^①陈宛茵:《江城书香惠学人——记旅汉治学成名的向宗鲁教授》,《武汉文史资料》2002年第8期。

语,与向先生名讳吻合,察验《说苑校证》、《淮南鸿烈简端记》二书^①,其间亦多有“承周案”,可证当出自一人之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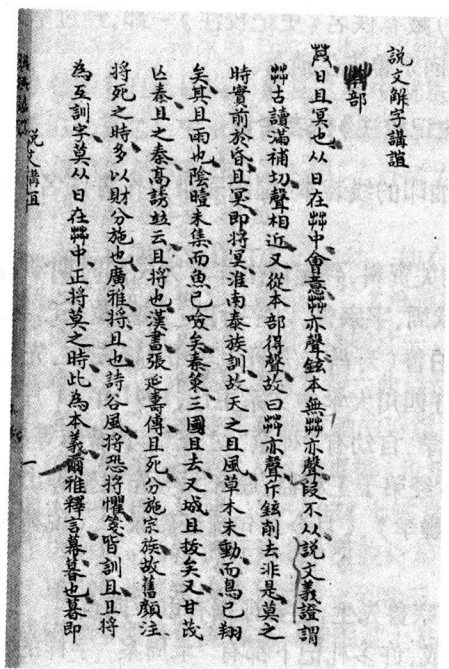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,《史记校注》中有的版心处有“向授”字样(参见图版1),与向先生姓氏吻合。

第三,《史记校注》中有的版心处有“重庆大学印行”、“重大印行”字样(参见图版1),而目前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,题有“巴县向承周编授”的《八代文讲义》(内题“选学丛录”)版心处亦有“重庆大学印行”的字样(参见图版3),可作类比。

第四,根据向先生弟子回忆文章所述,先生曾于重庆大学、四川大学讲授《史记》。



图版1:《史记讲义》



图版2:《说文解字讲谊》



图版3:四川大学图书馆藏《八代文讲义》

^①详参向宗鲁:《说苑校证》,中华书局,1987年;《淮南鸿烈简端记》,刊于《新国学》第二卷,巴蜀书社,2000年。

一九三二年秋,先生去四川大学,执教中国文学系。次年春,即返任重庆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。先生礼聘巴渝诸老师宿儒,开专著专课。以文伯鲁先生主讲《毛诗》,陈季皋先生主讲《左传》,龚春岩先生主讲唐宋文,八代文及《史记》则先生躬任之。^①

先生多识前言,熟精史事。举凡方舆典制,人物兴亡,莫不画地成图,抵掌可述。马班陈范,尤所究心。尝为生徒说《太史公书》,所造讲疏,精当难移,按条采录,即可成编。^②

在重大、川大任课时,以《史记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文选》为教。简端批校,朱墨灿然。^③

综合以上四点证据,可见国图藏佚名《史记校注》当是向宗鲁先生遗稿。另外,该《史记校注》后附有《说文解字讲谊》一卷(参见图版2)。

二、向宗鲁《史记校注》撰写时间、性质、定名再判断

根据上文征引何震华《忆恩师向宗鲁》一文记载,可知向宗鲁先生1933年、1934年前后在重庆大学讲授《史记》、“八代文”课程,国图所藏版心写有“重庆大学印行”、“重大印行”字样的《史记校注》可能即此时的讲义,与前文揭夔川大所藏《八代文讲义》为同时之物。除了这点相关性外,《史记校注》性质为《史记》讲义尚有三点旁证:

第一,《史记校注》中有的版心处印有“中文系”、“中、史一年级”字样,“中、史一年级”疑为“中文系、历史系一年级”的省称,大部分篇章的版心都有“向授”字样,结合起来看,当是教学讲义。

第二,《史记校注》中有多处学生笺注记录。例如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”“晋伐阿甄”条下,“通典”二字旁有小字注“唐杜佑作”,“晏婴乃荐田穰苴”条下,“梁曜北曰”旁有小字注“作《史记志疑》一书”;又如,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”“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”条下,“钱竹汀曰”旁有小字注“名大昕,清人”,“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”条下,“初学记”旁有小字注“类书,徐坚著”等等,这类涉及古代典籍常识的旁注,显然不会是“群经传记,洽熟无遗”的向宗鲁先生所记,必是学生使用讲义时的笺注。据此,亦可窥见该书性质为教学讲义无疑。

第三,《史记校注》后附有题为“说文解字讲谊”(此处“讲谊”之“谊”用

①何震华:《忆恩师向宗鲁》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:《巴县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,1994年,第72页。

②屈守元等:《巴县向宗鲁先生学行述略》,1941年11月。该文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罗鹭先生提供。

③屈守元:《说苑校证序言》,向宗鲁:《说苑校证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9页。

古字)^①,二者既然合为一编,性质理当相同,亦可推知《史记校注》性质为教学讲义。

厘清《史记校注》撰写时间、性质、用途后,反观该书定名,“校注”之称似乎欠妥,当是“《史记》讲义”。^②因此,国图的著录应订正为:《史记讲义》一卷附《说文解字讲谊》一卷,民国向宗鲁等撰,民国油印本,一册。九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。

三、向宗鲁《史记讲义》的内容特点及内部差异

向宗鲁先生《史记讲义》为线装油印本,包含《五帝本纪》、《伯夷列传》、《管晏列传》、《司马穰苴列传》、《孙子吴起列传》、《伍子胥列传》、《太史公自序》七篇,用三种纸张抄写,据此可分为三部分:

一是《五帝本纪》、《伯夷列传》、《管晏列传》合计四十五页;

二是《司马穰苴列传》、《孙子吴起列传》、《伍子胥列传》合计四十五页;

三是《太史公自序》二十七页。

全书皆半叶九行,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,间有双行小注,行款较为统一,然而三部分笔迹却存在差异,可能是不同人誊抄的。

从具体内容看,该讲义主要是对七篇《史记》“本纪”“列传”字句的训解、考证与校勘,三部分内容全以札记的形式呈现,“承周案”的案语贯穿全书始终。其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:

首先,旁征博引,具列历代相关的研究成果,尤其是梁玉绳(曜北)《史记志疑》、张文虎(孟彪)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》、钱大昕(竹汀)《廿二史考异》、王念孙(怀祖)《读书杂志》等,并参以类书引文,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疏证。

其次,参考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。在第三部分《太史公自序》里,征引了泷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,如“阮赵长平军”条下列有“日本枫山本‘阮’作‘拔’。见《会注》”,“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”条下列有“日本枫山本‘顺’上有‘曰’字。见《会注》”。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1932-1934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陆续出版印行,这部分讲义可能是在1934年之后写成的。

再次,不少条目没有案语,全引前人说法,甚至直接抄撮几百字前人考证成果,例如《五帝本纪》“以征不享”条作:

洪筠轩曰:“《索隐》‘一本或作“亭”,亭训直,以征诸侯之不直者。”

顾烺案:《诗·韩奕》‘干不庭方’毛《传》:‘庭,直也。’《国语·周语》‘以

①《说文解字讲谊》中未能找到与向宗鲁先生有关的线索,向先生的相关资料中亦无讲授《说文》的记载,因此《说文解字讲谊》的作者当存疑待质。

②下文为了避免讨论纷歧,有时仍称“《史记校注》”。

待不庭不虞之患’韦昭注:‘庭,直也。’《左氏·襄十六年传》‘同讨不庭’,不亭即不庭,古字通用。”

经查核,此段文字与洪颐煊《读书丛录·史记》“不享”条^①全同,这类情形也能反映出该书的性质是教学讲义。

此外,对于三部分之间的内部差异,值得作些说明。三部分讲义之间互有参差,但无本质区别。参差之处如下:

首先,第一、二部分里对《史记》正文相关联的“三家注”(裴骃《史记集解》、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、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)亦有疏解,标有“附注”,第三部分主要是对《太史公自序》正文的疏解,不涉及“三家注”。

其次,前两部分引梁玉绳、张文虎、钱大昕、王念孙等人说法,皆称字或号,第三部分全部直接称名。又,前两部分征引前贤旧说,只列作者,不标注书名,第三部分详尽标注书名。比如,引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,第一、二部分多作“梁曜北曰”云云,第三部分作“梁玉绳曰”云云,段末用双行小注标“史记志疑”四字。

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,可能和讲义针对不同的学生有关,第三部分的版心有“中、史一年级”字样,也许只是针对中文系、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教学讲义,所以对古人称名而不称字号,便于学生理解记忆,详注引文出处也是因材施教的需要。这些内部差异从另一方面证明《史记校注》必是教学讲义,因其为讲义,所以不求严谨统一,侧重实用性价值。

四、向宗鲁《史记讲义》的学术价值

向先生《史记讲义》在作为佚名古籍的情况下,已被编进《〈史记〉订补文献汇编》^②,更彰显了其价值所在。笔者以为,其学术价值归纳起来约有三端:

1. 对于研究《史记》的价值

以《史记》研究而言,该书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:

一是解读《史记》的价值,例如:

《五帝本纪》“神农氏世衰”条,向先生案语:“世衰谓末代君也。”

又如,“淳化鸟兽虫蛾”条,向先生释作:

《说文》:“蛾,罗也。在虫部。”又“蛾,蚕也,飞虫也。或作蠶。在蠶部”二字义别,蛾即俗“蚁”字,郭注《尔雅》《释虫》云:“蛾,罗。”以为蚕蛾,非也。《礼记》“蛾子时术”注:“蛾,蚍蜉也”。《左传·僖十五年传》“蛾”《释文》音“鱼绮反”,云“本或作‘蚁’”。《晋语》“螭蛾蜂蛋皆能害人”宋庠《补音》云:“蛾,音蚁。”以及《楚词·天问》之“虫蛾”、扬子云《长杨赋》之“蛾伏”、范书《黄甫嵩传》之“蛾贼”、《汉仲秋下旬碑》之“蛾

^①洪颐煊:《读书丛录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359册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页。

^②徐蜀主编:《〈史记〉订补文献汇编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年。

蚘”，皆其本义。说详桂氏《说文义证》。古音我声、义声皆在歌部，故“蛾”俗变作“蚘”，以别于“螫”耳。《大代》“虫蛾”作“昆虫”。

诸如此类的文句诠释虽未必为确证，但言之有据，至少提供了一种解读的新思路。

二是校勘《史记》价值。《史记讲义》里吸收了大量前人的校勘成果，但对这些校勘成果并不盲从，作了分析辨证。例如：

《孙子吴起列传》“卧不设席”条：

张曰：“《御览》二百八十引下有‘暑不张盖’四字。”

承周案：“《御览》二百八十一引《战国策》仍无此四字。”

这条案语显然是驳正张文虎之说的，一个“仍”字，道出向先生的立场：《太平御览》他处引书也存在无“暑不张盖”四字的异文，“暑不张盖”四字未必是脱文。

2. 作为教学讲义的价值

作为一份教学讲义，目前所见虽然可能未为全帙，但从现存的内容看，依然可以窥见向宗鲁先生教学设计的一些细节。比如，选读《史记》的篇次，《五帝本纪》和《太史公自序》一头一尾，都花了较多的篇幅讲解，《史记》五体“书”、“表”、“世家”皆未涉及，只重点选择“本纪”、“列传”，这些现象应与向宗鲁先生的教学思想有关，对当代高等教育中的《史记》教学也具启发性。

讲义注重吸收当时新近的研究成果，如前文所例举，第三部分里征引了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，这部分里还使用了1916年王国维先生发表的《太史公系年考略》。

另外，讲义常于细节处重点讲解学术疑案，比如，《五帝本纪》考证《史记》的书名问题，《伯夷列传》疏解伯夷、叔齐饿死首阳山一事等都用较多篇幅书写。

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讲授《史记》的讲义，该书对于研究民国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3. 对于研究民国学术史的价值

关于向先生的著作，屈守元先生曾说：“《周易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管子》以及其他批校诸书，全都失去。”^①可见作为及门弟子的屈先生是不知道《史记》讲义存世的。因此该讲义的发现，对于研究向宗鲁先生与民国学术史，以及日后整理向先生文集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综观《史记》讲义全书，常见向先生从《说文》出发，释读文字，尤其是借助《说文》研求本字、俗字，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但也折射出时代的烙印。

又如，向先生引《韩非子》几乎全称《韩子》，引《淮南子》某篇不用“某某

^①屈守元：《说苑校证》序言，第10页。

训”，而用“某某篇”^①，这些细节都可反映向先生的学术素养与学术倾向。

再者，从向先生引书可以看出，张文虎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》、王国维《太史公系年考略》等晚近的研究成果，已经广为接受；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当时才印行不久，就已为中国西南地区学者教学引用。这份讲义提供的这些信息，对于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者而言，都将成为第一手的珍贵资料。

五、余论

反思向宗鲁先生《史记》讲义发现的这一过程，有两点启示值得重视：

一是考察佚名文献的作者，寻求内证是一种有效的方法，要细读文本，找出蛛丝马迹的证据，尽量做到见微知著。

二是民国时期学者的大量遗著、佚著尚散存于世，有待不断发现考证。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，借助网络索引，查得向宗鲁先生遗著尚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《八代文讲义》，南京图书馆藏赵如编次的《大易类聚初集》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3年）内收录《周易疏校后记》一卷，经核实皆为向先生著作，这些资料对于考订《史记校注》作者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随着民国学者文集编纂整理的日益兴起，发现与查证佚著是一项必须的工作，如今发达的科技手段为此项工作提供许多便利条件，应当充分利用。

附记：本文初稿写成后，曾与四川大学罗鹭先生交流，承蒙其慷慨惠寄向宗鲁先生相关资料数种，国图刘明先生亦曾审阅全文，在此并致谢忱！

【作者简介】苏凡，男，博士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先秦两汉典籍文献及学术史研究。

①宋代以前文献中《韩非子》多作《韩子》或《韩非》，后世可能为了与韩愈著作区分，渐称《韩非子》。《淮南子》篇名的“训”字，前辈学者研究或认为本专指高诱注，称引《淮南子》原文当言“某某篇”。